

## 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谈党内代际转换

黄岩

2011-08-18 09:31:21

黄岩

**内容摘要:** 维护政治领导人更替机制的渐进性和连续性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置体现了中国渐进改革的特点,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参谋和助手,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的规范性、示范性、过渡性、原则性充分体现了它的特殊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内代际转换问题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 中央顾问委员会 政治继承 干部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博士 副教授

###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

1980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题发表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稿为改革开放后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1987年2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头版刊发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稿,同一讲话稿两次在我党的最高级别报纸上刊载,这是我党宣传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这既说明了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稿的重要性,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2年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的成立是中国干部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为最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任期制和退休制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方案,也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干部队伍的梯队接班制度建设,维护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保证了中国渐进改革方针的顺利进行。即以中央顾问委员会为对象,分析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成立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总结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历史价值以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意义。

“文革”结束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重建执政合法性的迫切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以政治稳定为现实目标,其特点是渐进性的。邓小平同志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发起人,也是改革方案的总设计师。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就是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成立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干部队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队伍老化和断层,随着一大批老干部复出,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大部分老干部都恢复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党政机构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一些老干部年高体衰,积劳成疾,很难承担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领导岗位的繁重工作。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消息,每天都有”。<sup>[1]</sup> 如何实现领导人新老交替或吐故纳新是摆在我党面前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既要解决年龄较高的领导人的“政治出口”,又要实现年富力强、充满活力的领导人的“政治接班”;既要保持党的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要使党的领导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也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的设置无疑是解决这个困境一个充满智慧的政治设计。

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后,在1975年7月1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在现在状况下提出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sup>[2]</sup> 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也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我们把许多冤案、假案、案处理了,好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负相当原来的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力不够”;“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sup>[3]</sup>

## 二、中央顾问委员会运转过程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决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并且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此后，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立就呼之欲出，具体的政策设计都开始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了。

### 1、邓小平同志的“8·18”讲话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中央已经设立了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sup>[4]</sup>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在人民日报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全文发表，这篇讲话稿也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年轻干部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个缺陷在六十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sup>[5]</sup>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改革制度也是指改革干部退休制度和建立顾问制度。

只有找到一条妥善的途径才能解决问题并避免出现因为改革而可能造成的政治上的动荡。1982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说：“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sup>[6]</sup>

### 2、中共十二大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第19条特别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2条规定：“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薄一波、任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开始吐故纳新，老同志的模范行动，也带动了上几百万超龄的在职干部陆续退下来。在172名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74人)；全部委员都是县级以上干部；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74岁。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增补魏文伯、奎璧、张苏、杜星垣、贾庭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由于李井泉等老同志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俊秀委员于1985年8月逝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了56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召开的这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加快干部队伍的改革步伐，因此它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历史上是有意义的。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人，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薄一波和宋任穷。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至此，中央顾问委员会在运转了十年后正式撤销。

经过调整后的中央领导人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比

		十二大	十三大	十四大
年龄	政治局常委	73.8	63.6	63.4
	政治局委员	71.8	64.0	61.9
	书记处书记	63.7	56.2	59.3
教育程度	无学历	3		
	小学	10		
	中学	3	5	3
	军事院校	3	1	1
	大专以上	9	12	18
总数	28	18	22	

资料来源：胡鞍钢，《中国：新发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67页

### 三、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特点

#### 1、规范性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党的组织系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尝试，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政治定位、组织原则和组织职能都要有进一步的规范。十二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中规定了它的政治定位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为实现政治局常委的年轻化，1987年十三大修改党章时删去了这一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要求，“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发现确实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应该采取帮助省委或者帮助某个基层组织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要注意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这些老资格，讲话是有人听的，是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其次，“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作用”。再次，“我们还可以起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我们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sup>[7]</sup>

#### 2、示范性

要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特别是年轻化，老干部的退出机制的健全十分重要。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的成立和运转过程中，一批老干部身先士卒主动要求退出领导队伍，发挥了很强烈的示范作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丧失工作能力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位置，这些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也为后来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起了示范作用。1981年7月，邓小平在与各省、市和自治区委书记座谈时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他还表扬了水利部长刘澜波主动让贤并推荐年轻干部接班。<sup>[8]</sup>

1982年8月十一届七中全会，刘伯承、蔡畅因年高久病要求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位，七中全会给刘伯承、蔡畅致谢信在人民日报刊登。党的十二大会议期间，85岁的杨秀峰和76岁的王德分别致信中央要求不再将他们列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按制度坚决离休。党的十二大主席团致信杨秀峰、王德、许在廉等老同志，同意他们的请求，并对他们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5年6月，王震、宋任穷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到：“我们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虽然雄心犹在，毕竟精力不如从前了。现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正在迅速成长。唐代杜甫有两句诗“古来有老马，不必取长途”，我们年已过期，且身体不好”；“我们恳切请示中央，在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让适合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sup>[9]</sup>

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等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李井泉等37位老同志致信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sup>[10]</sup>，黄克诚等30位老同志致信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全会给叶剑英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写了致敬信，在他们由于健康原因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时候，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全会认为党的十二大开始了党和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和合作，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为了使党的事业保持旺盛的活力，适应愈来愈繁重的工作要求，加快党中央领导核心年轻化的进程，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由于李井泉等37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出，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了56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又一批老干部退出一线岗位而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人民日报1985年9月17日刊登的李井泉等36位同志致中央的信特别提到：“我们这些老党员壮心犹在，但精力日渐不济，适时退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大有好处。这样做，有助于争取在十年内逐步完成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使命，有助于现在就把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规矩定下来，并在我们这一辈身上得到完满实现，有助于使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

岗位”。〔11〕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七位同志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不担任任何职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后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 3、过渡性

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得党的领导人必须寻求一种稳健的方式，既能推动改革的进行，又能使改革处在一种稳定的可控制状态。邓小平一开始就强调顾问制度的过渡性质，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12〕顾问委员会更适合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妥当”。〔13〕

1982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60岁的就是70岁，70岁的就是80岁，80岁的就是90岁，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14〕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十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15〕

从十三大以后，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的薄一波副主任就开始逐步减少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活动。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16〕十四大召开前夕，薄一波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提出：“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预期的进展；鉴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17〕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十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 4、原则性

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政治级别上来说，委员相当于中央委员，副主任和常务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第一届中顾委主任还必须是政治局常委，那么这个机构成立后如何来工作，如何来体现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顾问委员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邓小平还曾经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提过三点意见即：“量力而行，宜虚不宜实，宜少不宜多”。根据中共十二大党章的规定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定出《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规定共分九条：（1）、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2）、根据中央对有关问题的咨询要求，在缜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参考意见；（3）、受中央的委托或经过中央的批准，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4）、确定退居二线尚未离职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过渡期间，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协助所在单位把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接交工作认真做好；（5）、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6）、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要协助中央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现和选拔年轻有为的

干部。对已经选拔到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要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7）、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在遵守党章和宪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则，并且同各种违法乱纪和败坏党风的行为进行斗争。在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交往中要谦虚谨慎，密切合作，切不可老领导自居，发号施令；（8）、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一般说来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工作方式可以松散一些；（9）、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要精干，秘书、信访、行政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18〕

在内部管理上，中央顾问委员会也很快就建立起一套必要的制度：（1）、学习制度。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住在京外地区的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4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平时参加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学习；（2）、请示汇报制度。委员在学习讨论中反映的重要情况，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编成简报，及时向中央反映。对讨论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专题向中央报告；（3）、报告会制度。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定期地组织报告会，请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来作报告，使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策；（4）、调查研究制度。除了身体不好的以外，委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到自己过去长期工作的系统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也可以选择一两个基层单位进行蹲点调查。委员们的调查报告，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刊登于内部刊物《通讯》上，印送中央和有关部门参阅。〔19〕

1986年4月，在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薄一波副主任围绕怎样进一步做好顾问委员会工作提出“六要六不要”的工作原则：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要拾遗补缺，做各级党委、政府没有精力顾及的事情；要学习，包括学习政治理论著作、中央的方针政策、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便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开阔我们的思路；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不要当未经中央或省委批准的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不要发牢骚，即不分场合、不看对象，随便议论党的现行政策和人事方面的问题。〔20〕

#### 四、小结

中央顾问委员会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设立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撤销共存在了十年时间，它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置有效地推动了干部离退休制度，为打破干部终身制、建立起任期制和限任制奠定了基础，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健康运转。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置也顺利地推动了干部“四化”建设，保证了改革开放对“四化”干部的迫切需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内部的制度化代际转换和吐故纳新，为党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基础，也为我党权力内部更替提供了合法性的渠道，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来。而且，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伟大尝试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贡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些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长期存在着党和政府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这一弊端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象，破坏了党内团结。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国际共运史上的先河，成功地解决了干部交接班问题，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这也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从实践上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继承理论。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相关的程序和规则不断地得到完善，并最终以修改党章的形式来确立规范。老一辈革命家在干部更替和交接班上达成共识，从而避免了政治权力内部的动荡。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断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地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21〕

中央顾问委员会也是我党探索制度化政治继承的尝试，从中共十二大修改党章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开始，到1985年全国代表会议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队伍，再到1987年党内七位元老的半退与全退安排，依托顾问委员会这一形式，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领导集体的年轻化，也成功地完成了权力的和平交接，相比于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残酷路线斗争的惨烈更替形式，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制度化的和合乎党章的方式来推动干部更替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改革。

注释：

〔1〕《陈云文选》，第3卷，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19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333、33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3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9] 转引自张湛彬：《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十年历程》，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 [10] 由于中顾委委员刘俊秀于1985年8月逝世，9月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实际是36位健在的中顾委委员退出。这次全国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干部更替问题。36位老同志退出中央顾问委员会，56位进入中顾委，也意味着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又向前进一大步。这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新闻发言人朱穆之在回答记者提出时说，“如果等下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1987年召开时再解决进一步年轻化的问题，还要等两年，到那时再调整，调整面就更大”，见《人民日报》，1985年9月19日，“朱穆之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情况”。
- [11] 人民日报，李井泉等三十七位老同志致信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17日，第1版。
-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3—41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7] 转引自黎虹：《回忆薄老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十年》，党史文汇，2008年第2期。
- [18] 转引自黎虹：《回忆薄老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十年》，党史文汇，2008年第2期。
- [19] 转引自黎虹：《回忆薄老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十年》，党史文汇，2008年第2期。
- [20] 《薄一波文选》，第451—457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 [2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1—14页，三联书店，1989年。

责任编辑：刘济华 孔建会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8066**

